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21年长篇小说：在海水和火焰之间

□刘诗宇

今天我们似乎拥有无限丰富的文学生活，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在大众的精神生活中纯文学正徘徊于明灭之间。这种状态由来已久，“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早就不仅停留在现象层面，而成为我们理解、处理文学问题的机制与视角。

每一年的长篇小说都数量众多，拥有无限的丰富性。假设有精力无穷，能全部通读，那么每年的作品其实都能构成一部文学史。今天我们似乎拥有无限丰富的文学生活，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在大众的精神生活中纯文学正徘徊于明灭之间。这种状态由来已久，“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早就不仅停留在现象层面，而成为我们理解、处理文学问题的机制与视角。

“虚构的家谱”：革命史与生活秀

那么多人活着：文盲、秀才土匪、小业主……什么样的婚姻传下了我，是否游荡过汉代的皇宫？一个个刀剑之夜。赈运之夜死亡也未能阻止喘息的黎明我虚构出众多祖先的名字，逐一呼喊总能听到一些声音在应答；但我看不见他们，就像我看不见自己的面孔

——西川《虚构的家谱》

在基因的河流中，我是先辈的还魂转世，我彷徨时，他们的足迹能否印证我的未来？这不仅是诗人的天问，更是阅读大量长篇小说之后容易产生的感慨。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党史里有无数伟大的中国故事。朱秀海《远去的白马》写的是“千千万万当年为胜利付出了牺牲的代价，并在胜利后仍在承担胜利代价的人”；余之《生层叠》写从民国到当下终身奉献于“密码战”的谍报人员，他们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却矢志不渝；老藤《北地》写几十年前建设北大荒的父辈；温燕霞《虎犊》写流尽每一滴血的少共国际师战士；龙平平《觉醒年代》写早期共产党人与仁人志士的革命历程……2021年是主题创作的“大年”，一批兼具文学性与政治性的优秀长篇问世。如何讲好历史，是贯穿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条生命线，无数作家、理论家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过成绩也走过弯路，政治性和文学性的平衡，至今仍在文学生态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远去的白马》等作品之所以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原因就在于它们在和平年代普通人的感官层面上写英雄人物的遭际，赋予浪漫以真实感，以贴近读者的姿态书写悲壮。

与党史主题创作相映成趣的，是2021年一批描写当下日常生活的长篇小说。刘震云《一日三秋》、魏思孝《王能好》、罗伟章《谁在敲门》、黎紫书《流俗地》、钟文音《别送》、石一枫《漂洋过海来送你》、郑在欢《3》等都让人印象深刻。这些作品的共性在于描写出了日常生活的艰难、普通人生的可敬。《一日三秋》《别送》都是在轮回转世的氛围中，写人究竟要经历多少孤独、离别和内心挣扎，才能走完一生；《王能好》写凋敝乡村里落寞、早逝的人，小说中男女老少、家长里短、红白喜事一应俱全，茫茫看不到出路的少年，认命后背井离乡的男女，病痛、厄运缠身的老人，汇聚成一部乡村世界人物志或消亡史；《流俗地》同样通过一个人看到整个社群，透过盲女银霞的人生洞悉人情世故、茫茫众生。《谁在敲门》和《3》都写人物群像，蹉跎于人生海海的命运也许谈不上伟大，但绝不简单。

阅读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作品，1921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街头的游行者，或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战死、冻死的军人，如果突然穿越到今天这个远离寒冷、饥饿、战争的年代，会觉得自己来到了“天堂”吗？孤独、彷徨、焦虑的当下人如果穿越到了过去，会觉得曾困扰自己的事情不值一提吗？简单地谈，让两个故事背景下的人们互换身份，会不会碰撞出更独特的美学和思想？“穿越”在事实上不可能发生，但小说是将历史现实化、现实历史化，某种程度上

“纵向的深谷状的”现实与历史——读谢络绎长篇小说《生与死间的花序》 □马兵

策展人罗曼偶遇一位来历不明又深藏莫测的老画家，展厅、画廊、美院、佳士得春拍会密集而来，还有那么多各行各业的如数家珍的点评，《生与死间的花序》开篇，好像摆明了要告诉读者，这是一部写给都市白领的文艺小说。这部作品沿袭了作者擅长的都市女性生存世相的写作脉络。然而到了第二章，小说画风突变，乡下女子张银妮目睹了内战的残酷，她在恐惧和纷乱中救了一名男婴，而这恰巧救了她的燃眉之急……小说就这样不断折返于历史与现实，在罗曼对画家身份的解密过程中，江汉平原一个叫江黄的小镇上，鲁、万、陈三个盘根错节的家族和他们70余年的命运流转以一种绵密又浩荡的方式次第浮现。

小说“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谢络绎在这部长篇里所展现的，不仅是烹煮历史和深描现实的野心，还有一种沉稳的叙事耐性和相当扎实的材料储备的功夫。内战、解放、“文革”、改革开放，这些构成人物命运终极指向的巨型事件，在小说中以一种全息的方式存在着，阅读其中一些章节，甚至让人想起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所实践的柳青那种写作观念，即把有关农民和农村“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放到“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检查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在这部小说中，鲁、万、陈三家族的命运显然是作者精心设计的，但小说在展开时对每个家族的命运都有完整而适切的呈现，并未因为希望读者注意其历史叙事的指涉力而诉诸过多的说教。鲁水生和鲁开悟父子因有木匠的技艺被乡民视为另类，鲁开悟更是成为

能支配时间的虚构艺术。于是这样的疑问或者说设想，是否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和现实？在“虚构的家谱”中，先辈和今人之间幽微深邃的精神血脉汨汨流动，但时间之河的两岸，双方相望的眼神却闪烁着陌生。从十七年文学开始，“主旋律”创作就常因真实性、艺术性引发争议；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以降，“纯文学”的视野向消沉、有限的日常生活不断收缩，也饱受诟病。前者跃动如火后者深沉似水，构成了当代小说创作的宏观图景。在海水和海水之间是什么？天空偶有灵光乍现，川流不息的是通俗文学、类型文学，以及不断向内渗透的影视、游戏、动漫、短视频。这幅风景绝不乏壮阔和绚烂，但仍留有空白。现实的变化速度其实并不逊色于一百年前，当年的革命者血脉仍延续在今日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先行者身上。与此同时，人类的悲欢绝不仅饥寒生死，物质生活改善后又有了新的生存困境和精神难题，以今人更加丰富、纤细的感知进入历史，我们能获得更全息的认识。当代小说的空白之处，也许就在于火焰与海水的交融，以2021年的长篇为例，我们完全可以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站着读”还是“坐着读”：时代精神生活中的文学

2021年有不少让人读来大呼畅快、过瘾的长篇小说。马伯庸《长安的荔枝》写唐代小吏李善德遭人陷害背负“不可能任务”，竭尽算学、地理水文知识，在权力运转、人心博弈的生死压力下，将鲜荔枝在变质前从岭南运到长安。《长安的荔枝》并不是“职场逆袭”或“小人物开挂”的“爽文”。从文学角度，小说叙事堪称精巧，主人公在短短数月里飞度关山，这既是空间与时间的竞速，也是个体与世界的一场战争；从学养角度，作者熟习史料，离奇曲折的情节背后是丰富的史实细节，小说既天马行空又内功扎实；从思想性角度，将不可能化为可能更是巧妙的微观切口，直通向朝代兴替、人心灾祸。陈彦《喜剧》讲述了丑角演员贺加贝荒诞波折的演艺生涯。小说一半是丑男追靓女，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暗合人性的荒唐事不断挑动欲望的神经，一半是近几十年间喜剧乃至整个舞台艺术的发展史，白驹过隙、陵谷沧桑。贺加贝从艺人品并重的老派艺人变成喜剧明星，再到大数据喜剧和资本运作中的一枚棋子一个符号，背后是其喜剧艺术从劝人向善到低俗媚俗，再到纯粹为了激发“笑”这一生理反应而存在的变化。《喜剧》写的既是个人史也是社会史，既有传统文学作品的教化意义，又点缀着黑色幽默、荒诞的现代悲剧美学气质。

王松《飞花调》写的是民国逸事、江湖奇谈，“调”是“金皮彩挂评调评剧”等江湖“生意”中的一门，以设局行骗为生。千术高手的碰撞趣味横生，环环相扣的故事下面是热气腾腾、烟火漫卷的民国江湖。借助江湖前辈口授的“稀有知识”和丰富的田野调查，配上地道的津门语调，《飞花调》填补了史笔不及之处。

上述三部以及余华《文城》、东西《回响》、范稳《太阳转身》、周大新《洛城花落》和上文提到的《一日三秋》《王能好》等，属于可以“站着读”的作品。作者想表达的思想以贴近读者的状态呈现，它们有引人入胜

的开篇、连绵不断的冲突与叙事高潮，以及余波荡漾、让人欲罢不能的终篇。完全可以想象读者在公交地铁、飞机高铁或任何一个只有思维自由的状态，找到这样一本书，短暂沉浸其中再意犹未尽地回到现实，文学可以成为当代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精神伴侣之一。

与此同时，2021年也有很多长篇必须“坐着读”——排除私心杂念、种种纷扰，从忙碌的时间规划中辟出一个水火不侵的段落，静下心来读。林白的《北流》以及上文提到的《谁在敲门》《流俗地》《别送》等就是这样的作品，读者需抚平心绪，让思维、热情长时间向作品倾斜，才能欣赏作者语言的个性，进入作品营造的氛围，体会其中奥妙。“站着读”还是“坐着读”，就像在文论述的历史或现实、昂扬或沉郁，有类别和个性的差异而无优劣高下之分，更不是非此即彼。但在半是火焰半是海水的视野中，二者之辨及牵涉的复杂问题，或许值得讨论。

在今天这个文学需要和影视、动漫、游戏分享受众的时代里，人们能“坐着”面对文学的时间越少，作品是否好读与可读就越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上述那些能“站着读”的作品大多牵涉到不同时代的历史或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情状，因此好读——读起来“爽”并不一定是核心特质，让读者能加深对历史、现实、人生的理解，才有“不虚此行”之感才是。曾经这并不是值得一提的问题，甚至人们认为过于强调教化或认知功能会削弱文学性。但今天文学和现实、作者和读者的俯仰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普通读者虽虽妙笔生花，在认知水平、信息获取、生活经验上，与作家的差距却已明显缩小。作家也许要付出更多努力，在妥善处理人物、情节、语言等传统任务之外，将认知触角溢出文学和个人日常生活，蔓延到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以及流行文化等多种领域之中，才能创作出普通读者感兴趣的作品。

长篇小说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在扩大自身影响上付出过很大努力，其中之一就是让文学与影视结合。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古代变文、话本与说、唱表演的关系，在开端上，长篇虚构叙事文学一定程度上从属于舞台表演。后来剧本成为独立体裁，长篇小说的优秀之作仍被改编成影视，但这并不是它们创作的最初目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作品的影视化为作家带来惊人收益，新技术条件下成长的一代作家从小看影视作品，致使小说与影视的关系又有变化。越来越多的小说趋向“影像化”，作家更注重写那些容易生成画面感，能被视觉与空间捕捉和框定的东西，长篇小说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也往往被空间段落瓦解。这种趋势实属正常，只要文学不放弃自身的主体性，这种趋势亦带来新的发展空间。但2021年有些影视作品的原著长篇小说，以很像是剧本大纲而非小说的面目问世，就让人不得不警觉起来，重新思索文学与影视、文学声誉和市场效益之间的关系。

“站着读”与“坐着读”、大千世界与个人生活、影像化与文字，以及更复杂的市场效益与文学声誉、资本运作与艺术创作，都在不同维度上构筑着当下文学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状态。一分为二的风景令人目眩神迷，但更引人遐思的是二者交融之时。在火焰与海水之间有荆棘和歧路，更孕育着文学转换思维、延展自身的巨大空间。无论是赤霞为洋面镀金，还是深蓝无垠的天空映照地火，都值得我们期待。

殊发展历程，呈现中国农村面貌和农民精神状态在不同时代的嬗变，依然是很多写作者念兹在兹的事情。就时间跨度、人物铺陈、事件纷繁、冲突剧烈这几点而言，《生与死间的花序》具备一定的史诗品格，其厚重处自不待言。不过与此同时，作者又始终自觉警惕这种史诗品格的创作可能带来的风险，不愿在既有的史诗审美范式中做简单增量。如“花序”的书名所喻示的那样，小说的叙事确像一总状类花序，但开花顺序不是花序下部的花先开，然后渐渐往上，而是先从当下写起。罗曼这个叙述者固然承担着对鲁开悟及其他江黄人物来历的揭秘重任，更重要的一点或许是，她的个人化的视点，她与画家、鲁凌星等的碰撞在不断对线性的追溯中造成回差，小说中关于情爱、绘画和艺术史的描写，尤其是对红蓼入画的讨论其实是对史诗感的回调，在宏阔的美学定势之外建立起一种微观而丰饶的极具超越性的精神背景，从而让它与那些有着题材上的交集和共同史诗追求的作品有了根本的区别。

作为一部创作“变格”的作品，《生与死间的花序》也保留了谢络绎一贯的对女性细腻深沉的生命感应力的表现，从张银妮、林二姐到万云朵、鲁红蓼再到鲁凌星，三代女人各有各的传神，而且作者特别注意赋予她们一种特别执拗的神情，如鲁红蓼从小就爱收集各种废弃之物，在日后为面目全非的故乡留下那么多特别的见证；万云朵则痴迷用印刷体书写记录各种文件，对政策变化如数家珍。小说将鲁开悟最后的那幅画命名为《母亲》，大概也有为这些女性颂赞的意味。

谢络绎曾谈到她对“激烈的现实”的认知，她说小说“是纵向的深谷状的现实，强调复杂性。如果你被时间带着跑，就必然没有能力接近复杂”，而这一次，她带来的不仅是“深谷状的现实”，还有“深谷状的历史”，更有去“洞穿”这深谷的勇气。

新世纪以来，江苏小说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经历了深刻的转型，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作家队伍、文学生态、文学内部图景等方面呈现出新的格局和新的样貌。新世纪江苏文坛的中流砥柱，是在“新时期文学”中同样有着闪亮表现的“50后”作家，包括范小青、黄蓓佳、叶兆言、周梅森、储福金等。这批作家新作频频，展现出了旺盛的创作热情和较高的艺术水准。此外，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作家，包括苏童、毕飞宇、鲁敏、叶弥、李凤群、黄孝阳、曹寇等，在新世纪大多推出了各自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同时，以周荣池、朱婧、大头马、庞羽等为代表的“80后”“90后”作家陆续亮相，展现了很好的创作态势。

综观新世纪江苏作家的小说创作，其整体风貌和创作特色可大致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写作题材的丰富及多元化。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新世纪江苏小说创作都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新世纪江苏小说显示了强烈的现实关怀，显示了对现实的热情介入和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跟踪和回应。其中，周梅森的《绝对权力》《人民的名义》、张宜春《叹斜阳》、王向明的《大浪淘沙》均是聚焦官场生态的佳作。这类小说对文学表现政治或介入政治的方式有了新的思考，因此已逐渐走向成熟。格非的《春尽江南》、黄梵的《第十一诫》、陆涓南的《纸媒无故事》等则可归入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大类之中，或是展现当代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社会的精神困境，或是揭露这一群体在社会转型期中的生存境遇问题，最终是想探讨包含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们面对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时该往何处走的终极命题。丁捷的作品关注现实、追踪时代变革，《亢奋》以文化体制改革为背景，《撕裂》更是在《亢奋》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挖掘文化圈的种种败落现象，显示了对社会现实的可贵介入。

新世纪以来江苏文坛涌现了一批探讨学校教育和青少年问题的小说，有发人省醒的社会意义。毕飞宇的《大雨如注》成功塑造了一个事事以孩子成才为首要目标的典型式家庭。通过这篇小说，毕飞宇指出了当下教育对儿童的“异化”，展现出了现代教育观念与儿童个体发展之间的矛盾。荆歌的《毕业生》书写的是包括“我”在内的各科老师对问题学生门阀的关心和苦口婆心的教育，但是小说的结尾却是十分令人痛心，充满了无奈和隐痛。鲁敏的《小流放》聚焦当前教育中“陪读式”家长的生存困境。小说将应试教育的配角陪读家长放在了舞台中央，由此再现应试教育对于家庭的负面影响。此外，黄蓓佳的《宠物病房》、余一鸣的《东海岸边》、刘剑波的《悬挂的石头》等作品，也都聚焦当下学校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方方面面，显示出了新世纪江苏作家对教育问题的集体关切。

新世纪20年中国社会的发展是迅猛而深刻的。江苏作家从宏观或微观层面观察和叙述底层、乡土、都市等领域，形成了可喜的创作实绩，包括鲁敏的《六人晚餐》、黄梵的《等待青春消失》、孙频的《乱身》等；将目光放在乡土，描绘农村的历史和现实的，则有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叶弥的《向一棵桃树致敬》、汤成奇的《失语者》等；还有一部分小说，如毕飞宇的《睡觉》、戴来的《看我，在看我》、杨莎妮的《七月的凤仙花》专注于表现都市生活中茫然失措的小人物，揭示出他们的生存困境或心理问题。面对新世纪以来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江苏作家创作出了诸多鲜活的文本。朱辉的《七层宝塔》通过书写唐老和阿虎在进城中的一系列冲突和宝塔的拆除事件，探讨了乡村文明往何处去这一问题；魏微的《异乡》则通过进城女性许子慧在返乡后的一系列遭遇，意在揭示出在城市化进程中“重回故乡”已经成为一种充满难度的文化现象；余一鸣的《放下》直击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充分表现了人在经济发展与欲望膨胀中“放下”自身的基本底线，却又被生态环境反噬其身的后果。还有不少作家关注边缘群体的生存现状，如毕飞宇的《推拿》、鲁敏的《思无邪》、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等，均展现出了积极介入现实生活，努力反映当下问题，并以小说书写时代生活的创作精神。

历史小说的取材覆盖了古代史、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等不同历史阶段。古代史题材中高仲春的《大姜王朝》将目光放在春秋时期吴越争霸这一历史事件，姚凤明的《淮商传奇》则是在清朝初年的历史背景下，凌君洋创作的《天下》对《三国演义》的人物进行了重新塑造。这样的写作实践显示了作家从历史中来、又超越既有历史叙事的可贵现实。此外，陆永基的《重臣》、周德彬的《侯门虎将：周处传奇》、王资鑫的《大清盐商》等都可称作是该题材中的精品。在书写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的近现代史时，叶兆言的《刘骨铭心》以1926-1949年的南京城为背景，着重展示这一时期诸多南京人的命运遭际，表达作者对于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想象；张新科的《远东来信》描述了二战期间三万名犹太难民逃亡中国得到救助的真实故事，集中展现了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房伟的《猎舌师》讲述了一个厨师以厨道来复仇的抗战故事。此外，徐凤的《国畫》、吴翼民的《风雨浴德池》、刘志庆的《血染塘马》也都是较为精良的作品。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为背景的小说也在新世纪的江苏文坛大量涌现，并展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这类作品常常书写个体与火时代的复杂纠葛，折射出时代的复杂纵深和历史变迁。如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毕飞宇的《平原》及“三五”系列、苏童的《河岸》《黄雀记》、韩东的《扎根》、叶弥的《风流图卷》等。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江苏作家常常将历史与现实进行交融，历史洪流与当下现实常常一起进入作家笔端，从而达到以今溯古、古今互见。黄蓓佳的《家人们》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贯穿至当下，讲述了政治文化造就的婚姻对罗家园、杨云及其后代无法抹去的影响与时代伤痕。储福金的《黑白（白之卷）》通过描绘陶羊子、彭行、柳倩倩、侯小影等四代具有师承关系的围棋手在时代中的浮沉，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除了生存，我们靠什么与世界紧密相连。

在创作中凸显地域文化，展现江苏各地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是新世纪江苏小说的第二个重要特点。例如张苏宁的《枕河人家》是以潘家对于大孟鼎、大克鼎和《枕河图》的收藏、保护、捐献为主线，同时，也贯穿了大量关于苏州的绘画、音乐、民俗、医药等的描写，小说展示了作者对于苏州这座城市的文化想象和地方再造；还有在《天漏邑》中，赵本夫将苏北文化与天漏村的风俗习惯融合在一起进行叙述，既有乌托邦的文化隐喻，又有对地方文明历史变迁的纵情讴歌。

新世纪江苏小说创作的第三个特点，主要体现在文体意识的自觉和叙事技艺的创新。新世纪以来，随着苏童的《河岸》、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叶兆言的《刘骨铭心》等作品的相继问世，我们看到先锋文学的新一轮启航。例如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农村》是一篇充分追求小说的不确定性的作品，这部小说很好地融合了形式上的荒诞和内容的现实指向，可以堪称范小青写作生涯中的一篇上乘之作。储福金的《念头》在他的写作中同样具有开拓性的价值。进入新世纪之后，江苏文坛也逐渐涌现出了一批以魏微、黄孝阳、曹寇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具有先锋气质的作家，他们在小说创作中展现出了自觉的文体意识和较强的叙事创新能力。黄孝阳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众生·设计师》《众生·迷宫》等作品不断探索小说结构的新形态，具有很强的先锋色彩和思辨意蕴。此外，曹寇也可以称得上是江苏文坛中的一个“异数”，他的写作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不断反叛窠臼、寻找新途并建构新的叙事规则的过程。

总体来看，新世纪江苏小说在江苏文学的历史脉络中，在主题内容、叙事形态和价值关怀等方面，均彰显了强劲的活力和鲜明的纵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同时，作为中国新世纪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新世纪小说既有鲜明的地方性和时代性，也有超越地方和具体时代更为恒久的内在品质。新世纪江苏小说以其质量上乘、影响广泛而成为了各种文学评奖和文学史叙述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需要指出的是，从文学的读者市场和“走出去”情况来看，毕飞宇、苏童、叶兆言、徐则臣、鲁敏等江苏名家拥有相当可观的读者市场，他们的作品也被广泛翻译成多种语言，频频获得各种国际奖项。在他们的引领下，新世纪江苏文学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坛具有创造力和辨识度的作家群体，并广泛参与文学的跨国互动与传播。当然，面对更为强势的影视文化和流行文化，面对蔚然崛起的网络文学，并不占有太多优势的小说如何参与对大时代的总体言说，如何叙述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深思和洞见，如何创造出具有经典气质和存史意义的文本，成为江苏作家需要思考的问题，当然，这何尝不是中国小说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呢？

新世纪江苏小说整体观 □沈杏塔

